

收入分配不平衡和国企储蓄占比过高是制约消费两大因素

刘世锦

当前普遍认为中国消费不足，其中一个常见说法是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偏低，差距在 17 至 20 个百分点。通过分析 2022 年我国资金流量表发现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并不低。2022 年我国 GDP 总量约为 120 万亿元，居民（住户）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约为 80 万亿元（调整后），占比接近 66%，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。这 80 万亿元中约 53 万亿元用于消费，27 万亿元用于储蓄（占总储蓄的一半，另一半为企业储蓄），储蓄率约为三分之一，消费率为三分之二，这说明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。
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居民储蓄高度集中。据招商银行“金葵花”客户报告显示，20%的储户掌握了 80%的储蓄，而我认为这个集中度可能还要更高。这反映出当前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。少部分高收入人群主导了储蓄行为，而大多数人储蓄能力有限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处于净负债状态。

2022 年我国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也很高，达到 27 万亿。从企业股权结构看，三分之二属于国有企业，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几乎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，极少流向消费。这是我国消费率低、储蓄率高的一个深层结构性原因，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。2022 年我国全社会净资产达 756 万亿元，其中政府部门拥有 291 万亿元，占比高达 38%，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高位，而其他国家政府净资产占比一般不超过 10%，甚至为负值。

综上所述，中国消费率偏低的结构性原因有两个：其一是居民储

蓄高度集中，反映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；其二是企业储蓄中大量来自国有企业，而这部分资产收益并未直接用于消费。

在 2022 年社会净资产中，有 38% 是政府财富，而且国有企业股权占比也较高，这在投资驱动增长阶段有一个有利条件。但目前到了投资乏力、创新和消费驱动的发展阶段，继续以往的模式行不通了，应探索的是如何用好国有资产，用其收益去支持居民消费。比如，若能将一部分国有股权划归社保基金，尤其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并将国有股权资产收益用于支出，便可将“不能消费”的资产转化为“可以消费”的资源。实际上，“身份转一下，还是这么多东西”。在不改变资产总量的情况下，仅通过调整国有资本用途，就能够实现结构性改善。

其次是从终端需求构成看如何扩大内需。我现在提出一个终端需求的概念：从 GDP 中剔除生产性投资部分，剩下的即为终端需求，包括全部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（主要是房地产和基建）两块。我国全部消费占比一直很低，和国际相比差了 20 个百分点，但是过去通过房地产和基建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一结构性矛盾。而近年来房地产和基建逐渐趋冷，导致终端需求的问题暴露和突出出来。如果此时继续强调扩大生产性投资而忽视消费，投资将难以形成闭环，宏观经济将难以有效运转。在讨论扩大内需、财政政策投向等重大问题时，如果增量资金无法有效投入终端需求领域，整个经济循环便无法有效扩大。有删节。

（本文来源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。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）